

美國日本研究的形成與發展*

林超琦

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

美國是除了日本以外，研究日本的最大學術社群，主要研究單位與大學都有日本研究課程。而且，與其他國家的日本研究相比，美國的日本研究還依照不同學門領域分工，比較專業化。美國的日本研究算是相當成熟。美國的日本研究是如何發展的？本文將美國日本研究分成四個時期——形成期、奠定期、高峰期以及轉型期，以探討「什麼因素促成日本研究在美國的發展」、「誰研究日本」及「美國的日本研究的主題」，以期能對未來台灣在日本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日本研究、區域研究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09 年 9 月 24 日「當代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大會暨「比較各國日本研究學術研討會」。感謝當時擔任評論人佐橋亮教授，以及西川潤教授、Gregory Noble 教授及其他參與者會中、會後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指正。同時，作者也感謝曾閱讀最初原稿的蕭全政教授，及兩位匿名審人對本文所提供的評論與修改建議。

壹、前言

美國是除了日本以外，研究日本的最大學術社群。與其他國家的日本研究相比，美國的日本研究依照不同學門領域分工，比較專業化¹。有趣的是，美國並不是最早開始注意日本的西方國家。事實上，英國、奧地利、德國，在同時甚至更早便已開始研究日本。而且在二次大戰前，美國只有少數學校提供日本相關課程，到了現在卻是幾乎所有主要研究單位與大學都有日本研究的課程（Hardacre, 1998; Steinhoff, 2007），甚至還有設立專門研究日本或是亞洲的研究中心及圖書館，美國的日本研究算是相當成熟。

美國的日本研究為什麼能發展到如此成熟？一般來說，對他國的研究多半是源於地理上的鄰近性，美國向來也以西歐或拉丁美洲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對美國人來說，研究日本有比較高的語言障礙，美國為什麼對日本有興趣，要研究日本？什麼因素促成日本研究在美國的發展？尤其，中國研究向來是美國東亞研究的重心，日本研究何以能成爲一個單獨的研究次領域？學術不能脫離現實而存在，社會科學的知識建構主要還是爲了解決問題與提供答案。日本研究的發展是反映出美國的什麼需求²？政治、政策上的需求，還是經濟、文化社會方面的需求？

其次，要瞭解日本研究的發展，還要知道誰研究日本？日本政治研究，常常被援引做爲美國政府政策的依據。不可避免的，研究者的經歷與立場會影響他們對日本的詮釋。經歷過二次大戰與美軍佔領日本時期的學者，與戰後新生代學者對日本的想法必然不同。同樣的，學者與記者所關注的焦點也不同。知道是出自什麼樣背景的研究者做日本研究，有助我們瞭解

¹ 其他國家的日本研究大多是綜合性研究，比較沒有強調學門分工。關於不同國家的日本研究發展，見哈佛大學 Edwin O. 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於 1990s 末開始於時事通訊，Tsushin（通信），一系列不同國家日本研究發展的比較。

² 作者感謝蕭全政教授對於這個面向的建議。

美國學界有關日本知識是如何被建構。此外，不同國家的「日本研究」應該會有不同的面貌與不同的關注焦點，美國的日本研究都研究什麼？

台灣雖然在很多方面受到日本影響，也有許多對於日本有興趣的「哈日族」，但是台灣在對於日本的學術性研究卻是發展比較慢(何思慎, 2004；楊鈞池, 2007)。理解美國日本研究的發展，可以做為我們發展台灣的日本研究的借鏡。此外，台灣學界向來大幅引用美國學術界的看法，在引用美國日本研究文獻的看法之前，有必要瞭解他們是從什麼觀點出發，才得以避免一些過於以美國為中心的看法。

本文主要是在回顧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的形成與發展，而非文獻檢討。主題回顧將以筆者比較所熟悉的政治學為主。美國的日本政治研究，並不是從政治學所發展出來。相反的，是先有日本研究的發展，強調全面性的日本研究，之後才發展不同學門的專業分工。所以，要瞭解日本政治研究的發展，還是必須要從日本研究整體發展的過程才能瞭解。以下依照日本研究的不同發展階段，討論影響該時期日本研究的因素，並回顧該时期的主要研究議題。

貳、二次大戰前——日本研究的形成期

美國對日本的瞭解早期是仰賴歐洲商人與傳教士所傳來對日本描述的二手資訊。19世紀中葉，隨著培里將軍(Matthew Perry)率領軍艦打開日本門戶、結束日本鎖國政策，美國人對日本才得以有直接的互動與觀察。不過，學術上的日本研究則遲至19世紀末，於1896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才設立全美第一個與日本相關的教職(Jansen, 1988a)，其他地緣上較有關係的西岸學校，如舊金山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與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陸續開始提供日本相關的課程。之後，東岸學校，如：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哈

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等大學也相繼開設與日本相關的課程（Jansen, 1988a）。

在此之前，美國的東方研究，向來是以中國為中心，尤其是儒學方面的研究。主要大學開始設立日本相關的課程，顯示出美國對日本的興趣增加。日本相關課程的設立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經發展有關，除了美日貿易增加，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中國與俄羅斯兩次戰爭上取得勝利，吸引了美國的注意。加州柏克萊大學就是在中日戰後的隔年 1896 年設立日本教職，史丹福大學則是於日俄戰爭後 1906 年設立遠東歷史課程（Jansen, 1988a）。到了 1935 年，已有 25 所大學開設與日本相關的課程（Tansman, 2003）。

不過，美國學界雖然開始設立與日本相關的課程，在這個階段，除了少數學者來自日本或曾經在日本居住懂日文，懂日文的學者或是可以稱為日本學者有限。例如奠定戰後日本研究的主要學者 Edwin O. Reishauer 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時，是由漢學家 Serge Elisséeff 所指導³。事實上，哈佛大學到 1931 年也才有定期的日語課程。日本研究尚未被學界認可為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真正促成日本研究發展的關鍵是二次大戰及之後的冷戰。

叁、二次大戰後——日本研究的奠定期

由於二次大戰的發生，美國政府為了蒐集與翻譯日本軍事情報，急需懂日語的人才。在政府要求下，大學便針對軍方需求提供密集日語課程⁴。之後，為了佔領日本做準備，軍方也繼續訓練日語人才。這些懂日文或曾在日本生活的人，在戰爭結束後，許多人返回學校繼續學業與研究。由於

³ Reishauer 之所以能夠做日本研究，是因為他是在日本出生長大，直到 17 歲才回美國受高等教育，日語相當流利。

⁴ 非一般常態課程，而是專門為軍方所提供，較為強調口語的課程（Jansen, 1988a）。

有懂日語的優勢，許多人投入日本研究。相較於二次大戰前日語人才的缺乏，戰時軍方的語言訓練意想不到增加了會日語的人才、成為戰後日本研究的主力（Jansen, 1988a）。而日本研究的方向更因為冷戰的發生而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為了有系統地掌握各國情勢以作為國家安全政策參考之用，發展出以地理區域（非研究議題）為劃分基準的「區域研究」（area study）。由於日本對美國在冷戰時期的重要性，日本研究（包括日語學習）成為美國政府主要贊助的研究對象之一。在美國政府的主導與許多民間基金會的支持下，許多大學相繼成立日本或東亞相關的專門系所、研究中心及專門的圖書館⁵。不僅如此，對於研究所需要的語言學習與田野調查也有提供補助。

根據統計，1958 年到 1970 年，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在日本研究的相關教育經費上，就有美金 1,900 萬元的補助（Jansen, 1988a: 21）。在對所有區域研究的贊助中，日本研究獲得 10% 至 15% 贊助（Jansen, 1988a）⁶。就總額來說，也許不是那麼多，但是這些經費在田野調查及圖書館資源方面，提供了前所沒有的資源，使得日本研究有長期性且制度性的支援。一般來說，對於他國的研究，語言是做相關研究的第一障礙，這些資源使得學習日語與研究日本的成本大幅降低，學校能夠有系統地培育人才、鼓勵日本研究。尤其因為政府政策設立了許多與日本相關的職位，這些工作機會，無形中也提高美國人研究日本的意願，讓人有誘因去學日語，進而提高研究日本的意願。

冷戰的發生改變了美日關係，除了使得研究日本的需求提高，連帶地

⁵ 由於 1957 年蘇俄人造衛星射入太空，美國國會即在隔年 1958 年通過『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強力改革學校課程結構並加強科技教育，使聯邦政府藉由撥款，以推動聯邦政府認為重要的研究科目（秦夢群，1997）。如，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與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就是在教育部的補助下成立日本研究中心，定位為國家資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的一部份。

⁶ 最主要的還是對蘇聯的研究。

也改變日本研究的主題。在二次大戰結束美軍佔領日本初期，美日仍處於敵對關係，美軍在日本的重點工作是政治改革，希望改造日本成為非軍事的民主國家。然而，冷戰的發生，使得日本成為美國的盟友。由於戰爭期間，美國人民對日本有相當的敵意與不滿，為了要合理化推動日本研究的必要性，特別正面強調日本有值得研究之處，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本的現代化發展（Hardacre, 1998），探討做為後進發展國（late developer）的日本何以能夠在明治維新時期，快速且平順地將從封建的農業制度轉換為工業都市化⁷。

之後，更是在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贊助之下，透過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⁸，於1960至1966年連續舉辦6場探討現代日本政府與社會的現代日本研討會（Conference on Modern Japan），確立了以日本現代化發展過程為此時期的研究主軸（Jansen, 1988a; Tansman, 2003）⁹。

在此時期，現代化是所有日本研究的共同分析架構，不同領域學門從歷史、政治到宗教都是在這個架構下研究日本。不同學科共享一個分析架構，也反映出日本研究還沒有很細緻化的學門分工。這也是因為日本研究在當時還在發展初期尚未成熟，美國社會對日本的瞭解有限，還是在拼湊日本的圖像，所以日本研究主要重點是在求廣泛的介紹，介紹日本是什麼（what），學門領域的差別並不是太重要。普遍的看法是日本與美國不同，有其特殊性，尤其是文化上的特殊性，無法用西方理論來研究日本（Hardacre, 1998）。在這樣的脈絡下，日本政治也多是從日本的獨特性，尤其是文化角度去詮釋（Calder, 1998）。例如自民黨黨組織的架構與派閥的制度化發

⁷ 如學者 Smith（1959）探討德川幕府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對日本現代化的影響。

⁸ 亞洲研究學會是美國針對亞洲研究最大的學會。

⁹ 將重點放在日本近代化與當時的意識型態也有關。戰後的日本學者強烈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是冷戰時期，美蘇關係惡化，美國強烈抑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相較之下，現代化理論比較沒有意識型態的問題，在這個架構下，美國學者比較容易和日本學者對話（Jansen, 1988a）。

展，或是以個人為中心仰賴個人後援會的競選方式，學者往往歸因於文化解釋（Thayer, 1969; Curtis, 1971; Richardson, 1974）。

以日本現代化為日本研究方向持續到 1970s，因為越戰的爆發而有所改變。當時新一代學者，是在越戰時期成長，對於政府權威存疑。現代化研究某程度隱含著「所有發展最終會與西方國家趨同」的假設，年輕一輩學者質疑，強調日本現代化的研究，是把日本作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典範，以改造其他東亞國家成為美國所期望的發展。他們認為，這樣的研究是為了替政府外交政策服務，有其政治目的，而質疑以區域研究提供政府情報的必要性¹⁰。此外，他們也質疑戰後研究過於強調日本的和諧形象，他們認為所謂的「現代化」過程並不是那樣平順或正面，工業化也帶來相當的問題，例如農民運動。所以，不管從政治因素或是學術本身，現代化主題都受到挑戰，也使得之後的日本研究呈現比較多元化的發展。

雖然區域研究受到批評，日本研究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不只是因為日本政府也於 1972 年成立「國際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進一步推動日本研究，更是因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吸引了更多人研究日本。

肆、1980s 至 1990s——日本研究高峰期

二次大戰戰後日本經濟快速成長，1964 年成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晉升為已發展國家之列，1970s 初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此之前，儘管日本經濟表現在各方面都還是與美國有差距，沒有受到太大重視。直到 1970s 之後的發展，日本經濟發展才受到重視。

¹⁰ 對現代化理論學者來說，在當時，日本是唯一成功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非西方國家，也是當時東亞唯一的民主國家。與鄰近其他東亞國家或是拉丁美洲相比，不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日本算是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典範。但是，對新一代學者，他們批評福特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有關係，中央情報局資助基金會去舉辦活動，等於是為政府倡導美國的觀念，參見 Saunders（1999）。

首先，1970s 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已開發國家中，日本卻受創較小¹¹。其次，美日貿易赤字一直擴大，日本家電、汽車等產品迅速佔領世界市場，學者傅高義（Vogel, 1979）甚至稱呼日本為世界第一。尤其汽車工業向來是美國自豪的工業卻被日本趕上，對美國人來說，日本從過去是被美國幫助的小兄弟，轉變為能夠與美國競爭，會擔心美國被日本所取代。這種憂慮帶動戰後另一波日本研究。美國學界與產業，包括美國政府，想知道日本何以快速成長，會對美國產業造成什麼影響。

除了負面的憂慮，實務界的人看到日本經濟發展帶來的商機，也希望多瞭解日本。與之前的日本研究的不同，過去的研究很少是有商業考量，但是 1980s 連非學術界也對日本有興趣。不懂日語的人，需要有英文的日本分析資料，日語人才需求增加。在各方面對日本有極大好奇的情況下，在大學學日文的人數從 1983 年的 16,127 人大幅增加為 1986 年 23,454 人，單單 4 年內增加了 45.4%（Jansen, 1988b）¹²。研究人員，除了學者，還包括記者，甚至實際曾參與美日談判的官員也針對日本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出書做討論¹³。從事日本研究的人數，從 1970 年 597 位，增加到 1984 年的 1,535 位，到了 1989 年增加為近乎 4,000 位¹⁴（Tansman, 2003: 2）。在此階段，明顯的，市場需求促進日本研究的發展。

日本的經濟發展，帶動了許多研究，包括勞動市場、產業上下游關係等。有趣的是，研究日本的經濟學者並不多，反而是從政府、政策角度去研究日本經濟的政治學者比較多。換句話說，日本經濟發展所帶動的是日本政治經濟學者，而非經濟學者¹⁵。到了 1995 年，在研究日本的博士生中

¹¹ 如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Katzenstein, 1978）一書中，就是比較已開發國家在石油危機後的應對與發展，其中，有一章就是討論「為什麼面對石油危機只有日本得以成功轉型」？

¹² 就總額來說，中文與俄文仍是學系外語的主要選擇。但是，同時期學中文與學俄文的學生分別只有增加 28.2% 與 11.87%（Jansen, 1988b）。

¹³ 如記者 Wolfren（1989）、Fallows（1994）、Fingleton（1995），實務界如 Prestowitz（1989）。

¹⁴ 這包含比較廣義的日本研究者，若是以真正學術性研究者來計，人數沒有這麼多。

¹⁵ 受訪於 1998，許多當時的研究日本的新生代學者談到，雖然日本經濟表現吸引許多人

有 14% 是主修政治學，為單一學門中研究日本最多的（Tansman, 2003: 21）¹⁶。

在研究主題方面，最常被引用的論點就是由 Johnson（1982）於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一書所提出的「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型。對於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Johnson 認為日本經濟發展不是單純基於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有政府介入，透過產業政策將有限資源支持發展特定產業，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的結果。他不認為日本經濟發展是文化因素使然，而是受到制度的影響（1988）¹⁷。某程度來說，Johnson 的論點延伸是之前現代化理論時期學者的看法，對後進國家如何透過制度的設計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討論。同時，Johnson 的說法，也呼應當時 *Bring the State back In*（Evans, et al., 1985）、「強勢政府」（strong state）或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的論點，認為日本政府（在 Johnson 的討論中就是官僚）能夠抗拒利益團體的壓力甚至改變利益團體的偏好，而做出有利國家整體發展的政策。其中，優秀的官僚（也就是當時的通商產業省，現在的經濟產業省）扮演著領航員的角色，決定國家發展的方向，私人部門只是扮演跟隨與次要的角色。

1980s 以來幾乎所有日本政治經濟研究，不管是支持或是批判 Johnson 的論點，都要從 Johnson 的看法出發，去探討官僚的權力基礎，是否出身於特定的背景、學校，如何發展特定產業，如汽車產業、半導體產業等。其中，有些支持 Johnson 說法的人，更是將 Johnson 的觀點轉化為強調日本制度的優勢，發展出修正學派（revisionists）或是強調日本與美國不同的異質論。他們認為日本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會取代美

的研究興趣，單純做日本研究的經濟學者不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學強調理論與模型，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難被經濟學界所接受（古森義久，1999）。

¹⁶ 但是，若是以泛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背景學者相比，人數上，人文背景出身的學者仍是研究日本的主力（Tansman, 2003）。

¹⁷ Johnson（1988）以日本高儲蓄率為例，原本日本人民並沒有儲蓄觀念，而是明治維新時期在日本政府政策影響下，人民才有儲蓄的意願。所以，日本高儲蓄率不是因為文化或傳統而來。

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主張美國應該放棄自由市場經濟，仿效日本採用產業政策，擷取優勝者（pick winners），給予補助以提升競爭力，才能夠維持美國在全球經濟上的領先¹⁸。

Johnson 帶動了「誰統治日本？」的辯論，這些討論主導了 1980s 及 1990s 日本政治研究。同時期，也正是東亞經濟起飛的時期，許多學者將 Johnson 的「發展國家」架構運用到其他東亞後進發展國家（包括台灣），去討論經濟發展的動力，帶動了東亞政治經濟的比較研究，如 Amsden（1989）、Wade（1990）。即使是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 1993），也承認東亞政府的一些政策是對於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

當然，Johnson 的論點引起很多批評與回應。首先，有學者認為行政官僚不是那樣絕對優勢，行政官僚的影響力不該視為理所當然，Samuels（1987）與 Okimoto（1989）皆指出，成功的產業政策是取決於政府與私人部門的合作，政府的主導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其次，行政部門不一定是那樣有效率。通商產業省與產業的關係並不適用於其他部門。而且，不同行政部門各有自己的利益，當利益衝突時，往往無法有效地做出決定（Callon, 1995）。再者，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的角色被低估。官僚雖然也許具有資訊上的優勢，但是即便法案是由行政部門草擬，任何法案的通過（包括預算）還是需由國會議員通過（Krauss & Muramatsu, 1984），這賦予政治人物對政策影響的空間。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國會議員也累積相當的政策知識，並不是只是依賴行政官僚，甚至在重要法案上，常常否決官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扮演著近乎否決者的角色（Schoppa, 1990）¹⁹。此外，日本經濟也不是那樣全面的有效率。日本的出口導向的產業，的確是有效率的，但是，日本經濟其實是二元結構，也同時存在不是那麼有效率的產業（Calder, 1988; Woodall, 1996）。所謂的「擷取優勝者原則」，並不是適

¹⁸ 持此觀點的學者 Laura Tyson 後來還成為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經濟顧問，對當時政府政策相當有影響。

¹⁹ Johnson（1995）同意政治人物影響力有增加的趨勢，但是他還是認為 1970s 以來政治人物權力大過官僚的說法是誇大。

用在所有的產業。事實上許多不效率的產業，是自民黨的重要支持者，雖然不具效率、競爭力，自民黨政府仍給予補助（Calder, 1988）。

伍、1990s 中期以後到現在——變動中的日本，轉型中的日本研究

日本政治研究到了 1990s 有著許多改變。與之前的日本研究者相比，近年研究日本的學者，曾參與軍隊的比例減少，大部分是大學就有同時雙修東亞研究或是東亞語言系。新一輩的學者不少是 1980s 以來曾到日本教授過英語的大學生畢業生（參加「語学指導等を行う外国青年招致事業」（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me）回到美國後進入研究所。與 1980s 最大不同，1990s 中期之後，研究日本的熱潮有減緩的趨勢（Steinhoff, 2007）²⁰。主要是因為政治上，冷戰結束，日本的策略重要性減少，美國政府對於日本研究的補助也隨之減少。另外則是經濟上，除了因為中國的崛起，主要是因為日本經濟復甦遲緩，隨著日本經濟在 1990s 的衰退，日本不再視為是對美國的威脅，理論上與實務上的研究誘因也減少。此時期，對日本研究者來說，最大的挑戰是該如何研究日本。

日本政治研究到了 1980s、1990s 在各方面都相當深入，學門分工也越來越細緻化。一個重要的辯論的焦點則是該用什麼方法來研究日本。強調日本的特殊性？還是用一個普遍性的架構去研究日本²¹？如前所述，戰後的普遍的看法是日本與美國不同，有其特殊性，再加上，當時日本研究

²⁰ Steinhoff（2007）引用的定義比較嚴格，相較於 Tansman（2003）估計 1989 有近四千人研究日本，Steinhoff（2007）則是估計 1989 年有超過 1,600 位研究日本，1995 年上升到 2,300 位，2005 年則下滑到 1,800 位研究日本。若再區分學者與博士生，1989 年有 1,200 位學者研究日本，400 位博士生寫有關日本的論文，1995 年有 1,500 位學者研究日本，800 位博士生做有關日本的論文，2005 年有近 1,300 位學者及 560 位博士生研究日本。

²¹ 這也是其他區域研究面臨的問題。

正在發展中，有許多議題都還不清楚，甚至還沒有被研究過，所以，研究日本的學者，主要的工作是將日本介紹給美國人，做訊息的傳遞，比較描述性，也就比較不會注意理論的創新²²。日本政治也多是從日本的獨特性，尤其是文化角度去詮釋²³。但是，學者逐漸意識到有比較的研究才能建立比較好的因果關係與理論，若是過度強調日本的特殊性，會使得日本政治研究獨立於政治學主流（Richardson & Patterson, 2001），無法做比較、不利學術性對話。

雖然有共識不該獨立於政治學之外，要增加比較分析，問一個可以跨國比較的一般性問題，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有著相當大的辯論²⁴。會有這樣的辯論，主要是因為日本研究趨向成熟，個別領域對日本的研究也更為深入。隨著專業化的提升，個別學門更強調日本研究該重視理論與研究方法。其中，將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運用到日本研究影響相當大的辯論。尤其以 Ramseyer 與 Rosenbluth（1993）的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最具代表性²⁵。Ramseyer 與 Rosenbluth 將政治人物與官僚的關係定義為代理人關係，也就是官僚是政治人物在追求與執行政策的代理人，做決定的是政治人物，官僚只是執行政治人物的政策論點與之前強調的官僚優越性的研究不同，他們的重點是在政治人物。不過，之所以引起很多批評的原因是在於，作者們的論證方式。

²² 這是 1990s 美國研究日本新生代學者在受訪時所做的表示（古森義久，1999）。

²³ 當然，日本在許多地方與美國不同，不容易被比較。如日本雖然有定期選舉，卻是長期由一黨執政。民主國家怎麼會由同一個政黨持續執政？會有日本是否是民主國家的質疑。

²⁴ 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將既有的政治理論去檢證或是加以修正運用到日本政治分析，例如引用多元主義去討論日本決策過程，如 patterned pluralism（Krauss & Muramatsu, 1987），或是引用統合主義去討論國家社會關係（Pempel & Tsunekawa, 1979）。或是像 Zysman（1983）等探討日本與其他國家金融制度的異同及其不同發展。對於自民黨長期執政，Pempel（1990）將日本與其他也有政黨或聯合內閣長期執政的國家做比較，以找出自民黨何以長期執政的原因。不過，日本近期的發展使得比較研究有更多的題材，如其他國家也有選舉制度改變。

²⁵ 其他同時期引用理性選擇研究日本的主要學者，還有 Jun Kato、Masaru Kohno、Michael Thies 等人。

過去的日本政治研究比較是在總體層次的討論，Ramseyer 與 Rosenbluth 則是採用理性選擇為研究途徑，重點是在行為者，提供的是個體分析。源於經濟學，理性選擇是假設行為者都是自利且追求利益極大化。運用到政治學，行為者所追求的利益不限於物質利益（金錢），主要在於權力與勝選等，以追求勝選為前提之下，去演繹行為者可能的策略。將理性選擇運用到日本政治研究，主要是認為日本政治人物與其他國家政治人物沒有不同，都是以追求勝選為前提，不強調也不認為日本政治有特殊性。譬如，派閥的形成與延續，政調會委員制的產生都是為了強化個人／自民黨勝選而發展出來，而不是像過去所說，文化上日本人喜歡（習慣）群體或重視個人關係，所以組成派閥。

傳統日本政治研究者包括 Johnson 對這樣的發展有很大的反彈（Johnson & Keehn, 1994），他們批評這樣不是研究日本的方法。他們的批評主要在於，普遍性的架構常常忽略了脈絡的討論與對歷史認知的缺乏。他們質疑是否理性選擇適合研究日本？是否真能幫助我們更瞭解日本？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理性選擇分析對日本的瞭解是錯的。

如果說 Johnson 或其他學者太強調官僚的優越，Ramseyer 與 Rosenbluth 等人則是太強調政治人物的控制力，而忽略了官僚在資訊上的優勢。事實掌握與理論同樣重要。但是，本文以為，對於事實面的批評，不足以去推論理性選擇是否適合運用到日本研究。因為「是否合乎事實？」是論證上的證據是否足夠的問題，非理論邏輯的問題。同樣在理性選擇下，也有講到資訊不對稱造成的代理人問題，政治人物的優勢不是絕對（Moe, 1984）。更何況理性選擇已經廣泛運用到其他研究，理性選擇也只是研究方法的（架構）的一種，不該是零和（zero-sum）辯論問題²⁶。不過，現在很少人在研究上特別強調是理性選擇或是不是理性選擇觀點，因為個體分析層次，對

²⁶ 當然，理性選擇選學者為了強調與過去的學者不同，只是一味批評既有的日本研究是錯的，或是根本不大引用既有的日本研究文獻，會有傾向特意否定過去，而有打稻草人的謬誤（straw man fallacy），沒有學術上的對話。

行爲者的假設，在政治學中是必須的，其次，研究方法很多種，重點在是否具有邏輯性與對理論的建立有幫助，大部分的人都是演繹與歸納並重。

除了方法論上的辯論，日本 1990s 以來的政治經濟變化，也迫使學者必須要思考該用什麼架構來研究日本政治經濟。如前所述，戰後日本研究之所以可以這樣發展，是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除此之外，日本由於戰後長期由自民黨執政，使得日本政治非常穩定，也有助於日本研究的發展。同屬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雖然同樣受到美國政府支持，但是在 1978 改革開放之前，不斷的政治動員，使得研究上所認定的主要行爲者一直在變，不利研究，使得先前研究所建立的權力架構、行爲者互動模式，常常會受到突然的政治事件影響，無法再適用（Harding, 1984; Haplern, 1993）。相較之下，日本研究沒有這樣的問題，長期的政治穩定使得權力關係相當穩定，有助於研究的深化。再加上資訊取得比較不受限制，田野調查的資料也相當可信，日本研究到了 1990 在各方面的研究都相當深入。然而，1990s 日本的發展，使得過去所累積對於日本的理解似乎不再完全適用。

首先，經濟上，1980s 末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之後卻遲遲無法復甦。1997 開始銀行、證券公司倒閉，一連串金融問題，銀行不倒的神話不再。這些發展考驗著如何用既有的理論去解釋變化。剛開始大部分學者認為日本制度沒有問題，只要稍微修正就可以恢復。Fingleton（1995）甚至認為日本終將會在 2000 年超越美國取得經濟地位的領先。但是，隨著經濟一直沒有起色，越來越多質疑日本制度本身的問題。如 Katz 認為是制度本身的問題，需要全面性的改革。日本政治經濟的研究問題從「日本何以這麼成功」改為「日本應該如何改革」、「為什麼日本無法有效改革」？

長期被稱讚的官僚，由於無法有效處理經濟問題，而被認為是為了私利，所以才不願意改革，被批評為是造成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再加上一連串弊案，官僚反而成為改革的重點，被抨擊的主要對象²⁷。再加上東亞

²⁷ 除了經濟問題，官僚一連串的弊案消息也使得人們對官僚的形象大為改變，有才使得在 1996 年眾議院選舉，除了共產黨以外，所有政黨都以「行政改革」為訴求。其中

金融危機，1980s 的主要架構發展模式備受質疑。許多過去被稱讚的優點，現在卻被認為是阻礙日本復甦的原因²⁸。明顯的，之前建立的研究架構有運用上的問題。

其次，雖然日本經濟復甦相當遲緩，被稱為「失落的 10 年」(Lost Decade)，但是在制度上，同時有相當多的改變，如政治上，選舉制度從「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SNTV) 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行政改革部門大型重組，增加首相職權、設立副大臣，以提高政治主導（降低官僚影響力）。因應金融危機，金融監督的權限也從大藏省分離，獨立成立金融廳，對於銀行採取更嚴格的監督。面對這些制度上的變革，另一個研究的主題是：日本政治是否會因這些制度改變而有所改變、如何變²⁹？在改革的起初，許多批評日本沒有改變。因為自民黨仍是執政黨，而兩黨制也沒有如預期立刻出現。但是近期的日本政治的確是與 10 年、10 年前教科書上描述的不同，制度改革的效果也慢慢呈現，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上台後，越來越多人承認，日本是有在改變，只是改變的方向不一定是符合當初的預期。

日本政治研究主題與日本政治變動息息相關，面臨日本政治的改變，日本政治研究也得尋求新的研究架構。但是，新架構並不容易建構，主要是因為日本政治過去相當穩定，有影響力的主要行為者 (actor) 一直都差不多，權力關係沒有太大的變化。分析架構上，大抵都是以鐵三角為架構（政治人物-官僚-利益團體），只是對於誰有比較影響力給予不同權重。過去在一個穩定的架構（「不會變」的假設下）討論他們關係如何存續、政策產出，現在如何用一樣的行為者去解釋改變？如果是他們的利益、偏好改變，又是什麼因素造成改變？尤其在 2009 年 9 月自民黨下台，民主黨取得執政後，原有的分析架構，勢必得修正，這將是未來日本政治研究的

被抨擊最厲害的是過去主管財政與金融的大藏省（現改為財務省）。

²⁸ 過去被認為有助於政策推動的緊密政商關係，現在反而被視為成為貪污的根源。過去被稱讚的有助於穩定的產業結構，如交叉持股，也變成不利改革、復甦的因素。

²⁹ 如 Carlile 與 Tilton (1998)、Amyx 與 Drysdale (2003)、Krauss 與 Pekkanene (2004)。

主要挑戰。

陸、結論

什麼因素影響日本研究的發展？國際大環境、美日關係、美國內政、日本本身的發展及學術界的研究方向（對於學門訓練與區域研究的看法）都是影響日本研究發展的因素。只是在不同時期，有些因素扮演比較強的因素：戰後初期，主要是國際情勢（冷戰）及美國內政（政策）影響到日本研究的形成與研究方向。之後，等到研究資源比較有了基礎，影響日本研究的議題，則是越來越受到日本發展的影響。整體來說，日本研究一開始是政治性，定位在服務政府、幫助做政策的區域研究，強調對日本全面性的瞭解與日本的獨特性。之後雖然還有政治上、政策上的需求，促使日本研究大幅增加的則是經濟誘因。現在則是比較是學術上研究的誘因（日本政治的變與不變，如何變）在吸引新一輩的學者。

誰研究日本？美國的日本研究學者，按出身背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住過日本，來自傳教士家庭（如 Reishauer、Rosenbluth、Schoppa）、學者家庭（Steven Vogel）、經商家庭或是父親在軍營，所以有居住過日本的經驗。第二類是軍旅生涯受到日文訓練（因戰爭而知日的社群）。第三類曾到日本教授過英語的大學生畢業生，回到美國後進入研究所。雖比不上第一類學者曾長期生活在日本，也是有相當的經驗。整體來說，出身於傳教士家庭、住過日本的比例相當高。近年研究日本的學者，曾參與軍隊的比例減少，大部分是大學就有同時雙修東亞研究或是東亞語言系。

回顧美國日本研究的發展，對於發展台灣的日本政治研究有什麼啓示或意涵？本文以為，是研究資源制度化。學者如 Patricia Steinhoff（1993）曾強調個人是出於對日本文化的喜愛，而研究日本。但是本文以為，純粹文化上的喜好，不足以轉化為學術性的研究。個人喜好無法說明，為什麼日本研究是在戰後突然增加。從前面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美國政府或

是基金會提供經費，造就了美國日本研究的形成。如果沒有透過研討會連續舉辦現代化議題討論，或是贊助特定研究方向，戰後日本研究也不一定會朝向現代化發展的研究。

再者，由於建立許多研究中心，除了培養研究日本的美國學者，建立跨領域的對話平台，也與日本學術單位交流，邀請日本學者或是官僚做長期訪問，甚至連在學的研究生也有機會與直接參與日本政策的官員接觸，這無異給予研究日本的學者最直接的聯繫。這樣的網絡關係，有助於資訊的分享與辯論。

此外，有了穩定的研究資源（經費），研究也不會因為市場因素（經濟誘因改變），而大幅減少³⁰。隨著日本經濟在 1990s 的衰退，日本熱減少，但是，幸好先前建立的資源、網絡關係已制度化，使得研究日本的人數仍維持一定。更重要的是，有相當的研究經費，學者才能支付起到日本做田野調查的費用，不會只依賴二手資料，而能有原創性的研究。雖然現在許多資料網路上可以找到，甚至日本國會圖書館的資料，也可以直接線上要求影印，無須本人飛到日本去找資料。但是許多資訊仍是要到當地，透過直接的觀察與對話，才能有比較深入的瞭解。畢竟政治不是只是最後公布的政府文件或是選舉結果，過程也一樣重要。台灣如果要發展具有特色的日本研究，相當的研究經費與資源是不可少的。

³⁰ 日本方面的經費贊助，尤其是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的確也是促使美國日本研究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 1980s 以後有相當的影響。但是，在本文的討論中，筆者沒有針對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做討論，因為若是沒有美國政府在戰後一開始創造出的需求，使得美國本身的學術社群先對日本有興趣，美國的日本研究也不會有這樣的發展。

參考書目

- 古森義久。1999。《透視される日本——アメリカ新世代の日本研究（ジャパノロジー）》。東京：文藝春秋。
- 何思慎。2004。〈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與改善〉《亞太研究論壇》26期，頁82-93。
- 秦夢群。1997。《教育行政——實務部份》。台北：五南。
- 楊鈞池。2007。〈從歷史情結到科際整合——台灣的日本政治研究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發表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當代日本研究的方法、理論與實務之對話研討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1月5日。
- Amsden, Alice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yx, Jennifer, and Peter Drysdale. 2003. *Japanese Governance: Beyond Japan Inc.* New York: Routledge.
- Calder, Kent. 1988. *Crisis and Compen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 Kent. 1998. "The Turbulent Path to Social Science: Japanese Political Analysis in the 1990s," in Helen Hardacre, ed. *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36-53.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Callon, Scott. 1995. *Divided Sun: MITI and the Breakdown of Japanese High-Tech Industrial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lile, Lonny E., and Mark C. Tilton. 1998. *Is Japan Really Changing Its Ways? Regulatory Reform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urtis, Gerald L. 1971. *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ese Style: With a New Prefa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llows, James. 1994.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ingleton, Eamonn. 1995. *Blindside: Why Japan is Still on Track to Overtake the U.S. by the Year 200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Hardacre, Helen. 1998. "Introduction," in Helen Hardacre, ed. *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vii-xxviii. Leiden: Brill

- Academic Publishers.
- Harding, Harry. 1984.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pp. 284-307.
- Halpern, Nina. 1993.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pp. 120-37. Armonk, N.Y.: M. E. Sharpe.
- Jansen, Marisu. 1988a. "History: General Survey," in Marius Jansen, e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7-26. Tokyo: Japan Foundation.
- Jansen, Marisu. 1988b. "Japanese and Chinese Studies Compared," in Marius Jansen, e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138-146. Tokyo: Japan Foundation.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88. "Studies of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A Crisis in Theory," in Marius Jansen, e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95-113. Tokyo: Japan Foundation.
- Johnson, Chalmers.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 Johnson, Chalmers, and E. B. Keehn. 1994. "A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National Interest*, Vol. 36, pp. 14-22.
- Kato, Junko. 1994.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Tax Politics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1978.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Kohno, Masaru. 1997. *Japan's Postwar Party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uss, Eliss, and Michio Muramatsu. 1987.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L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tterned Pluralism," in Kozo Yamamura, and Yasukichi Yasuba,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pp. 516-5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auss, Ellis, and Robert Pekkanen. 2004. "Explaining Party Adaptation to Electoral Reform: The discrete Charm of the LDP."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30, No. 1, pp.1-34.
- Muramatsu, Michio, and Ellis S. Krauss. 1984. "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in Policymaking: The Case of Jap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1, pp. 126-46.

- Moe, Terry.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 4, pp. 739-77.
- Okimoto, Daniel. 1989.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1990. *Uncommon Democracies: 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and Keiichi Tsunekawa. 1979. "Corporatism Without Labor?" in Philippe Schmitter, and Gerhard Lehmbruch, eds. *Trends toward Corporatist Intermediation*, 231-70. London: Sage.
- Prestowitz, Clyde. 1989. *Trading Places: How We Are Giving Our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Reclaim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 Ramseyer, Mark, and Frances Rosenbluth. 1993.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radely. 1974. *The Political Cultural of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chardson, Bradley, and Dennis Patterson. 2001. "Politic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Significance of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1, pp. 93-115.
- Samuels, Richard. 1987. *The Business of Japanese State: Energy Markets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1999.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 Schoppa, Leonard. 1990. *Education Reform in Japan: A Case of Immobilist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Smith, Thomas. 1959.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inhoff, Patricia. 1993.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ss of Irrelevanc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Bulletin*, Vol. 13, No. 1, pp. 1-9.
- Steinhoff, Patricia. 2007.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ities and Opportunities." (http://www.fas.harvard.edu/~ncc/minutes07August/minutes_07_august.html) (2008/08/22)
- Tansman, Alan. 2003. "Japanese Studies: The Intangible Act of Translation,"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pp. 194-2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ayer, Nathaniel. 1969. *How the Conservatives Rule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lfren, Karel Van.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A. A. Knopf.
- Vogel, Ezra.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odall, Brian. 1996. *Japan under Construction: Corruption, Politics, and Public Wor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ysman, John. 1983. *Governments, Markets, and Growth: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o-Chi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US has the largest community, outside Japan, doing Japanese studies. How have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ed like that?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o different stages to answer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factors trigge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States?” “Who study Japanese studies?” and “What hat topics do they mainly focus on?” Hopefully, this article would be able to draw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Japanese studies in Taiwan from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Japanese Studies, area studies